

炫耀式消费所拉动的都市畸形风尚

范伯群

内容提要 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四大城市,在清末民初的近现代转型期间,它们的官场、商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沿革、地缘优劣和社会变异形态,但清末民初官商们的炫耀式消费却又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形成了一幅幅都市畸形风尚长卷,成为清末与北洋军阀时期的社会景象和文化景观。这些大城市都市风尚的变迁及其特色,在晚清、民初的通俗文学中都有着形象化的反映。

关键词 炫耀式消费 清末民初 都市风尚 五口通商

范伯群,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15021

清末民初近现代转型期间,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的都市风尚,在历史沿革、地缘因素和国制国情变迁的大背景下,各有特色。上海过去仅是松江府治下的一个县城,由于它襟江带海、内陆腹地物产丰饶的地理优势,在1843年开埠后一跃而为国内第一大都会,成了全国的“工商中心”,它的都市风尚的变异最为显著;而作为老大帝都的北京,它在清廷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的统治下,仍是所谓“政治中心”,它相对还是比较保守,但也由于国体的改制,它的官场也发生了一定的变易;广州原有清朝对外“一口通商”的显赫地位,但在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的新情况下,它的贸易额很快被上海赶超,对外通商的势头迅速被上海一马当先,但它在地缘上因靠近香港和澳门等殖民地以及与南洋各地密切联系的历史沿革,又有它自己的色调;天津是“北方的上海”,一度曾号称有9个国家的租界,但在洋场氛围之外,它又靠近北京,许多大官僚在天津租界均有他们的豪华别墅,同时它又是许多军阀官僚下野后妄图东山再起的避难所与安乐窝。这些大城市都市风尚的变迁及其特色,在晚清、民初的通俗文学中都有着形象化的反映。

—

上海在1843年按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条款被辟为商埠。外国侵略者于1845年与清廷订立《上海土地章程》,允许英国人在黄浦江畔的380亩土地上开辟纯由外国人租用的居留地,当时是以“租借”的形式订定的,但外国侵略者用各种手段从“租借”发展为“租界”,乃至在华洋杂居后单方面霸道

地建立外国政权,成为从清廷手中“割让”的“国中之国”。到1895年,英、美、法三国的租界面积竟达到了33503亩之数,加上还在不断地越界筑路,面积竟达到最初的380亩的百倍之巨。总之,侵略成性者得寸进尺,而清廷则一再退让,奴颜婢膝,丧权辱国。于是上海形成了一市二制三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面。一市是当时统称为上海市,二制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存,三治是上海老城厢由清廷管辖,英美租界当时已合并为公共租界,由英、美人治理,法租界则由法国人统治。当侵略者形成“国中之国”之后,在清末民国的历次动乱之中,他们皆以所谓“中立”面貌出现,以收“渔翁之利”。他们宣称:租界“平时为大商埠,乱时为极乐园”。于是“上海,上海,成了万商之海”。1892年开始连载到1894年出版全书的《海上花列传》是较为成功地反映上海洋场的典范之作。在韩邦庆的这一作品第一回,就反映了乡下人进城的情节。在工商发达的前提下,它必然会迎来一个人口大爆炸的特大移民潮,而人口大爆炸来源主要就是大量的破产的赤贫农民进城,成为后备的劳动大军。当移民潮的流速之快、流量之多、流幅之宽超过都市容纳量的极限时,又会形成一支失业大军。韩邦庆在第一回中就涉及这一乡下人进城的问题:“赵朴斋咸瓜街访舅”。赵朴斋从农村到上海来寻访他的舅舅洪善卿,希望在上海为他找一只“饭碗”。而洪善卿乃老商业移民,已在上海经营一爿参店。当时的咸瓜街行栈林立,人烟稠密,洪善卿的参店就开在大商埠的这一闹市区。赵朴斋初到上海就一头扎进了上海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地,作品中写他迷恋上海的繁华,有若干细节为证。当洪善卿知道侄子赵朴斋在上海不务正业,已沦为黄包车夫时,就责令他回乡,为他购好船票之后,还派店员押他上船。店伙完成任务后回店交差,赵朴斋趁船即将解缆启航时,又一脚跳上了上海滩。赵朴斋的妹子赵二宝与母亲到了上海,赵二宝也为上海的声色所惑,甘愿在上海挂牌为妓。这对过去的农村少女来说是匪夷所思的。这一情节说明在当时的上海“笑贫不笑娼”的颓风已经成形,也就谈不上“羞耻”二字了。《海上花列传》另一特色是将商人作为小说的主角,文人才子在小说中只扮演了“清客”的角色。这在过去中国的传统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新特色。过去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排行,商人不过是“四民之末”,但在这万商之海的都市,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飙升,竟成为“四民之首”。原来曾将“老大嫁作商人妇”看成一种人生的遗憾与末路,现在却将在妓院中肯挥金似土的商人尊为上客。

社会制度变了,物质基础变了,思想观念也随之而变。在万商之海的大都市中,为了猎取财富,社交的功利色彩也变得更加浓郁,社会的互动之频繁超乎上海原住民的想像。中国传统社会的交友准则原是以“义”为重,在这种新环境下,人际关系天经地义地变成了以“利”相趋。而且社交活动主要不再是一种休闲的方式,而是一种谋生与谋利的手段与策略。现在称之为“公关”,实际上是“攻关”——攻开金钱盈利之门。在这种时代风尚面前,社会思想观念也必然大起变化。例如,过去社会崇尚节俭,以此为传统美德,可是在那时却反传统美德之道而行之,认为节俭是“无能之辈”的生活守则。只有拼命的花钱才能大把赚钱,于是炫耀式消费成了社交场中的新宠,成了富豪身价的耀目标志。越是有钱或装成有钱的人,社会上的信誉度就越高,争相与他交往的人就越多,而炫耀式的消费是经济实力强劲的一种表现,至少是一种暗示。于是挥霍消费就成为某些商人的一种经营理念。追求时髦,嫖妓、豪赌、抽鸦片、进舞厅、看戏捧角,成了与官场勾结或商业交易中的黏合剂和媒介手段。妓院、赌场、戏馆、舞厅、茶楼如雨后天晴,节节攀高,纷纷向穷侈极奢的豪华型发展。于是上海就得了“东方巴黎”的“美誉”,其他大都会也纷纷向它的炫耀性消费看齐。

今天一听说是妓院,就觉得这是“性交易”场所。但是妓院在清末民初时,主要功能还是一种“交际场所”,特别是高等妓院,先是称为“书寓”,后来又称为“长三堂子”。当时将书寓与长三作为商业谈判、官场应酬、文人雅集的交际场所。这些高等妓女少有陪宿,只有彼此交情特别契腻时,才偶然留宿。所以平襟亚的《人海潮》中说:“要听歌选色,该入妓院;要发挥欲性,非入肉林不可。”何谓“肉

林”?就是妓女中最末一等的“野鸡”。在《海上花列传》中写了殷实富户的一对兄弟朱蔼人与朱淑人,弟弟只有16岁,还是个在“捉蟋蟀”玩乐的年龄段。他哥哥朱蔼人就带他进妓院了,朱蔼人对弟弟进行一种炫耀消费的独创教育法,他要带弟弟到这种场合中去“历练历练”,增强他的抵抗力。因为在他们这些为官为商阶层中的人是经常要泡在妓院里的,或广交朋友,或谈货物交易,或结识权贵,或享受温柔乡的滋味,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说:“倪住家来里夷场浪,索性让俚噪白相相,从小看惯仔,倒也无啥要紧。勿然,一迳关来噪书房里,好像蛮规矩;放出来仔,来勿及个去白相,难末倒坏哉。”在这些殷实富户看来,炫耀消费是必修课,但如果从小不见惯就会像未套笼头的野马,就有倾家荡产的危险。总之,他带弟弟到这种场合中去,是“恐淑人年轻放荡,难于防闲,有心要试试他”。可见当时的商人觉得这种地方并不可怕,越多接触,也就越无所谓。长兄若父,这是若父的长兄的特殊教育法。他大概要弟弟在“历练”中对这些地方有一颗“平常心”。哪知他的弟弟被一个雏妓勾引住了,当这位雏妓不甘作妾,定要做大老母的愿望没有得逞时(这对殷实富户家庭来说,是根本不允许突破的“底线”),雏妓就一定要逼他弟弟一起“殉情”,服毒自尽。她先将一杯生鸦片一吞,明知对方定会请医生来急救,但这个苦肉计一施,使朱蔼人大为紧张,经谈判,最后是赔偿这个雏妓一万元才算了结。一万元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目,到那时朱蔼人才“始而惊,继而悔,终则懊丧欲绝”。

德国叶凯蒂女士在研究清末民初的上海妓女时,说上海妓女是中国第一代的女商人。我认为这一论点是十分中肯的。在万商之海中的妓女是上海“无烟工业”的一支商业娘子军。胡适对《海上花列传》中的一个典型例子非常欣赏,那就是卫霞仙如何对付她的客户姚季莼的正妻姚二奶奶到她长三堂子里来兴师问罪的一幕。姚二奶奶带了这么几个健壮的女仆上门,在兴师问罪之后,非要将她的堂子打得落花流水。正当大家七嘴八舌的婉劝姚二奶奶息怒时,卫霞仙一声大喝:

“勳响,瞎说个多花啥!”于是卫霞仙正色向姚奶奶朗朗说道:“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碗。耐啥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的都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耐个家主公末,阿是勿许倪做噶?老实搭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管牢仔,为啥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故歇勳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句!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二少爷末怕耐,倪是勿认得耐个奶奶碗!”

胡适称赞卫霞仙的口才,说她一席话说得“轻灵痛快”。其实卫霞仙有鲜明的个性还在其次,她敢于朗声回击,主要是她吃透了她从事的是一门“生意”,上海洋场上是承认她是一门正当的营业的,她开堂子,按规定交捐纳税,租界当局正式发给她营业执照。她是受租界的法律保护的。她作为特种“女商人”出卖的物品是色相,进堂子的人是她的顾客,就是来买这种货色的。这种炫耀性消费所拉动的畸形风尚,她认为是“冠冕堂皇”。她的“新”观念已是洋场上公认的“规矩”,她有恃无恐;而这位“妆饰入古”的姚二奶奶在封建社会中可以对“兴师问罪”,在洋场上就只能大哭而归了。

既然是“女商人”,就以取得最大的利润为目的。过去将商人看成是俗物,对士人和官吏是有点尊敬之情的,可是到了上海成为万商之海之后,妓女是欢迎商人来光顾的:

现在上海的客人,大约要分两种,一种官场,一种商界。论起来,自然是商界的客人好做,既肯花钱,又不闹什么标劲。官人们看着银钱面上,也不得不敷衍他些。但是也有一样难处,那些商人,平日之间寸铢积累,刻薄成家,看得那银钱十分郑重,你若要取他的钱来,比要他的命更加刻毒,万一浪费了他一文半钞,更是一生的刻骨之仇。独独到了堂子里头挥霍

起来,一日千金绝无吝色,面子上装得甚是大方。^[1]

这当然是对商人属性的一个概括的分析。于是在商人与妓女之间就有一番尔虞我诈的较量。一方为征歌选色,一方为多榨银钱。有的为了征服客人,竟在客人的食物中放泻药,客人“病”倒在妓院后,妓女又衣不解带地日夜服侍,令客人十分感动。有的竟答应娶她作妾。于是嫖客就帮她还债,为她赎身,可是一旦娶回家去,她过了一段时间,毫不客气地将嫖客丈夫的钱财一卷而远遁,在妓界名之曰“忽浴”。即洗清爽她的前债,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而所有的妓女都想使自己“红”起来。只有“红倌人”,大家才会趋之若鹜,大家才会一起来捧。当时小报界流行搞花界选举,先是选状元、榜眼、探花,后来就流行选总统、副总统与总理。选举结束后就登报,还编什么《海上群芳谱》的小册子,弄得热闹非凡,弊端百出。妓女与小报编辑勾结起来,搞贿选,买选票,无奇不有;更有那袁总统的总统府来提出抗议,说总统是很庄严尊贵的,怎么给你们用到妓界去糟蹋呢?但是即使在这样狂热的你争我夺的选举中,通俗小说有时还不忘写出妓女们的斑斑血泪。例如在《人海潮》所写的花界选举中,还有“总统登基训词”的新玩意。那位副总统的训词云:

今朝承情唔笃诸位少爷老爷选奴做副总统,奴面孔浪是笑出来,心底里是要哭出来,为啥呢?奈想像佢格辈人,吃爱碗饭,也叫唔说法。好像从小跌进害马坑里,做一日生意,熬一日苦头。要想早点跳出害马坑,只是唔不格种机会。现在诸位少爷老爷弗情愿救我佢来,翻要我佢做大总统副总统,那末奴自家想想,好像田鸡跳进井里做皇帝,快活也是有限得势格。奴勿会说话,要请唔笃诸位弗要动气,原谅我一点。

上文讲了妓院在当时的主要功能,也讲了妓女在这种炫耀式消费中对嫖客的态度与若干手法,再谈了捧红妓女的种种社会怪相,其中也有被捧红的妓女所发出的血泪斑斑的倾诉,也能看出妓女的光鲜外表后面的内心痛楚。

二

炫耀式消费表现之一是看戏捧角。看戏本是一种娱乐,或者再高尚一点,是一种艺术享受。可是在现代化的大都市看戏,与炫耀式的消费一联系起来,就堕落成一种玩物丧志的荒唐举动。上海在开埠之前原是一个县城,它的捧角现象与国内捧角最突出的北京相比,当然是属于低水平的。而作为帝都北京,以宫廷中的慈禧老佛爷捧角为标杆,影响社会上的捧角畸形风尚是令人咋舌的。捧旦角,捧坤角,捧童伶,无奇不有。因此,要谈捧角的炫耀消费,当以北京为最甚,特别是北京的官场。官场对角儿的大捧特捧的背后就是“玩角”,那就更为乌烟瘴气。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可算是揭露民初官场捧角最淋漓的长篇了。在第28回《惜玉笑量珠舞衫扑朔,献花染同指捷径迷离》中,写总次长们在旦角的家中聚赌:

牌九推到12点钟就歇了手,算一算胡春航赢了五千,钱青化输了两千,卢南山输了一千八,孔亦方输了一千开外,金善予却只赢几百块钱。除赢家而外,得了头儿钱三千八,胡春航将筹码子放在桌上分了一分,划出三千八百元来,指着小翠芬道:“这是你的,拿去买一辆车罢。”小翠芬听了这话,眯着眼睛一笑,站起来退了一步,对着五个人,共总请了一个安。笑着说道:“谢谢您哪。”胡春航对孔亦方道:“怎么样?这汽车不是你送的吗?”……孔亦方抽了一张信笺就着桌上的笔墨,行书带草的写道:“即付来人大洋五千六百元整,某年月日亦方。”……多的一千六百元,算送给你的,你买珠花也好,买宝石也好。……小翠芬原来也认

[1]张春帆:《九尾龟》第26回,《说瘟生平心论嫁娶 评嫖客谈笑骂官商》。

得几个字,看看那张纸,只写五千元又没有图章,又不像个支票,便问道:“凭这个就能拿钱吗?”胡春航道:“连你这么一个小角,难道这一点小事还没有经过不成?”这句话说出来,臊得小翠芬满脸通红。

其他的人走了,胡春航却在那里“一直闹到天亮,到了下午一点钟,胡春航要出席阁议,才坐着车到国务院去了”。这不是捧角的目的是“玩角”吗?但张恨水的笔不屑去直接实写那龌龊的勾当。总长们手面之大,一张两指宽的白条,就能顶上五千多元巨款。这炫耀性的捧角就算是北京的“官场模式”了。

当时北京的北洋政权是全靠军阀支撑局面的,因此军阀的气焰甚嚣尘上,而他们在北京的玩妓与官场相比更为畸形。张恨水在《春明外史》中还写大军阀将领到的五万军费随手作玩妓的“豪举”,一夜就花个净光。在第80回《满座酒兴豪锦材夺美,一场鸳梦断蜡泪迎人》中,写手下有数十万大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军阀关督理,到京来向总统索要85万元军饷,结果只弄到5万现款。他非常不痛快,要将弄到的钱在今晚“花掉拉倒”。在与军阀、官僚、政客的大型宴会上,他用18辆汽车,拉来四五十个妓女,在一个个得重赏后,还要来一个所谓“余兴”节目。他拉另外的三个大帅一起做临时新郎,找4个雏妓做临时新娘,点起红蜡烛,买下这4个雏妓的“初夜权”。北洋时期的军阀能将军费如此挥霍,却又使总长们“相形见绌”了。他们参与这样的大型宴会,也只能做军阀应声虫的角色。

在通俗小说家叶小凤的《如此京华》中也写了北京官场捧红信人的丑闻。名伶青儿在南方也唱红过,但在民初她却到北京去“弃伶从妓”,改名挹芬。人家说她你戏唱得很好,何必改业上窑子呢?她自有一番见解:

一时有一时的机会,前儿的北京,窑子只是下等人走动的地方。如今光复了,南方来的不是元勋,便是伟人,北京的眼光慌忙兜转过来……戏子是产在北京的,窑姐是出产南方的,现在北京人心理不把戏子比肩的官吏放在眼里,却把窑姐同乡的革命党抬到天上,我又为什么定要守着旧例,去上戏园呢?

她认为到北京去做红妓,要比在南方唱红风头更健,顶要紧的是赶上“一时有一时的机会”的浪头。从她这番高见出发,就另辟码头,重打天下,凭南妓北上的时尚风光,果然使北京的名公大卿趋之若鹜。挹芬的门前车水马龙,自有一番盛况。翻出她家的账簿,不是某王爷的堂差,就是某总长、某督办的花酒,都是些了不得的大官僚。既然这些大吏将他们的办公室搬到挹芬的家中似的,他们就在此商谈“国家大事”。连她家的龟奴也有资格大吹法螺:

你道我不过是个龟奴罢!同你说句亮话,我这龟奴可比候补知事强多呢!……此龟非寻常小龟,乃京中特别之龟。……论事呢,不要说一个绿豆般的知事,就是大几倍的,也只消我家姑娘一语。

至于他家的姑娘则更加“海”了:“那一个替国家办事的人,不借窑子做过签押房来?前天那位什么秘书长,在我那里请客,来的说都是内阁大臣外阁大臣的,听他们一个菜还没有上,把什么内务总长外务总长的事议妥了。”

与上海相比,北京相对要保守些,炫耀性消费还是由官场独占鳌头,不像上海商人的后来居上。但是像军阀的霸气冲天,公然用到手的军费作嫖妓之资,倒是一种政权只能靠军阀支撑的新佐证。再说炫耀性消费“人才”的倒流:南方的妓女北上,使嫖客豪门化;而北京的名角南来,在上海逐渐掀起捧角的新高潮,也算是一种拉动都市畸形风尚的新交流。

三

在炫耀式的消费中,人们乐此不疲的还有一个“赌”字。牌九、扑克、麻将,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花样,如广东的“花会”与上海的“打诗谜”等等,不一而足。打麻将始盛于清朝,也是转型期中的一种主要的“娱乐”形式,起初会此道的人也不多。在通俗小说中常写到学又麻将的事。农村或小城镇上的人,还是要来到大城市后,才能受到麻将的“启蒙教育”。《广陵潮》与《海上花列传》中皆有此类情节。当时,上海有各种“总会”,北方有各种“俱乐部”,广东有各种“赌馆”,可以让人们献赌技,过赌瘾。可见,嗜赌是各地都有的歪风。张春帆的《宦海》是从广东的赌风写起:

只说我们中国南洋一带,广东是个最紧要的口岸,最富庶的地方,百姓也甚是开通,市面也十分兴旺,只有两件不好的事儿,却是赌风最盛,盗匪最多。……广东省城里头更是赌馆如林,不分昼夜……弄得那广东全省的人都像着了迷的一般,有了钱就跑到赌馆里头去赌,赌输了把那身上的衣服剥下来再赌,赌到那无可如何的时候,就索性去做起强盗来。所以广东一省盗匪最多,每每的白昼抢劫不算什么事情。这个赌馆,就是那制造强盗的机器一般……

赌虽各地都有,却以广东为甚,特别是广州。它曾作为清廷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占着“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对外关系特别密切。而靠近它的香港、澳门的赌场也是他们的“近水楼台”。特别是澳门1874年就已有赌博合法化的法令,赌场专营,并由政府开设,吸引大批华人去澳门豪赌,其中以广东人占多数。这种赌风当然也会传染到广东,于是在本地也大开赌馆。再说,广东也是通过港、澳向外洋贩卖华工的基地,有些不法之徒专门引诱贫困国人参赌,甚至主动借赌资给他们,说是为他们铺一条致富的捷径。专等他们输光欠债,就逼迫他们卖身,他们靠向外洋输送“猪仔”发财,因此,广东除了豪华的赌场以外,还有许多下等的赌馆,与其说是赌馆,不如说是“陷阱”。在吴趼人的《发财秘诀》里就写了惯偷花雪畦在走投无路时,先到新安赌场里去做看门的,看到有人输急了,欠了大笔赌债后,他就花言巧语骗他们到香港去找猪仔行的阿元哥,说是不仅能赖掉赌债,还能为他另谋职业。实际上是踏进了猪仔行,就永远休想再逃出来了。新安县知事的公子因输了数百金公款不敢回去见父亲,他趁机也将他骗进了猪仔行,被卖到了外国去。最后知事查出他乃教唆指使者,要抓他,他才逃到上海去再干那些更丧天害理的事。

在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中,是很写了几场赌局的,里面还讲有人靠赌为生,有人竟是“翻戏党”,写尽了赌中的弊端百出,无非是要人们以此为乐,在乐不思蜀中倾家荡产。作者还借人物之口,痛陈赌博之害:

世界上“吃”、“着”、“嫖”、“赌”这四个字……“吃”、“着”两字究竟花消尚小,“嫖”是无底洞了,却还不像“赌”字的为害最大。譬如一人有了数十万的家业,吃、着是一世吃、着不尽的了,就是嫖娼宿妓,差不多也要十年八载工夫,方能渐渐消磨;只有这个“赌”字,一掷千金,莫说数十万家私,就是数百万、数千万的资财,也可立时荡尽。何况赌字里头的弊端最多,摇摊、抓摊、牌九、麻雀,处处有弊,防不胜防。

说起弊端,就是在赌博时做手脚的“翻戏党”。孙玉声也是在小说的几个场合中叙述过的,如麻将中的抽心、挖角、砌夹四、捞浮尸、仙鹤吃食等等;牌九中的砌小头、双劈开、双别十、拍多张、抢过门、拗龙头、退龙梢等等,他虽然没有详说种种细微末节,但光看这一堆名词,就令人觉得黑幕重重、险象环生了。还有各种切口、赌诀,还要识牌练眼光,简直是一门学问,无怪有人可以靠赌为生。包天笑的《上海春秋》中就写了一个靠赌为生的人:

人家说他每年的春天总要到天津地方去一次。因为上海的赌局还没有天津大,天津每年在正月底二月初的时候,终有几场大赌。有好几个俱乐部都是豪赌的场所。在租界里面索性连外国人也通过的。到那里赌的人都是那些阔军阀、阔官僚,每一场赌总要几十万上下……

既然阔军阀、阔官僚皆如此全身心投入,就必然有人混迹其间,甚至可以靠此升官发财,还可以靠赌博来公行贿赂,办成获利千百倍的大事。在何海鸣的《十丈京尘》中,郝筱泽可说是个靠赌博起家的人。他是在民国元年靠赌友的介绍,才在司法部里谋到个办事员的小差使。平时在官僚们的赌圈中混些小油水。正巧,前财长和当任的币法局总办正想物色一个精于赌博的做顾问,认为他有入选的资格。于是他就在币法局总办的家中做清客。他是专门服侍总办赌博的,被大家戏称为“赌博仕”(小仕系日本的僮仆)。先是只配管“赌筹”,并立在总长、总办身后看牌,有咨询时,也参加些意见;后来在总长、总办要抽大烟时,临时代搓几副牌;再发展下去是在三缺一时,也充当一个角色。于是登堂入室,先是从司法界转到更有油水的财政界,白天上班,晚上仍然侍候大官僚们赌博,渐渐做了贴身秘书,终于成为这两个大官僚身边的第一等红人。最后在两个大官僚的政治交易中令他代表两人的利益而做了一个叫做“满顺银行”的行长。银行开张时,有人送来一副对联庆贺。上联是“顺子同花六七八九十”,下联是“满和倒蜡东南西北中”。既将“满顺”两字嵌在其中,也对他的出身有所讽刺,可算是绝妙佳联了。两位大员靠他这个银行出面借外债与内债,再把借来的钱借给财政极度困难的北洋政府。在这一手包办中,便将优厚的利息,两头的折扣,经手的佣钱,一齐落到他们的手中去了,真是大大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做的是无本万利的勾当。

何海鸣还写了某省要有自制钱币的权力,就去贿赂币法局总办,用的是“赌博行贿”的办法。在赌博中一副牌就送给币法局总办五万大洋。这个人情还要送得非常技巧:在牌局中,似乎无意地先请这位总办所宠的一个妓女坐在送贿人的后面观局,让她作为见证人,看他如何将总办“喂”成一副好牌,他在总办上家,自己不和,却让总办“满和倒蜡”。散局后,请这位妓女向总办委婉说明。其时,总办还沉醉在这副难得的好牌的“胜利”之中。等到妓女隐约透露了真相,经过总办的回味后,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一番美意:

便捻了捻短须,微笑道:“这个人真有些小聪明,连我也被他蒙住了。这样看起来他求我的事,也必得替他帮忙了。不过改天还得同他大大赌一场,并不许他弄鬼,叫他知道我打牌的真本事,不一定是要求人暗中帮助的。”

赌徒好胜心强是必然的,他不承认他是靠别人暗中帮忙才大赢特赢的,但他毕竟笑纳了别人的“赌博贿赂”。他回报人家的何止百个“五万”,千个“五万”呢!至此,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这炫耀式消费中拼命的花钱的目的是为了拼命的赚钱。而坐在牌桌上,也不是为了休闲与消遣,而是为了社交,而社交的目的是“求生”,为了求得大大的盈利。

何海鸣还在他的《十丈京尘》中将天津靠近北京的地缘大做文章。天津又是北京大官僚们纳宠藏娇之地,更可在天津获取洋场的一切享乐,于是每到星期六下午,必要乘火车到天津渡星期假日,到周一再从天津返回北京。有一个司法部名叫贡济川的小官天天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但他无背景又无靠山,只是靠“单相思”是跨不过道道“铁门槛”的。但他灵机一动,一不要媒介的介绍,二不要看阔人门房的脸色,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居然靠单枪匹马,毛遂自荐,也做到了人上人的地位。你道他用的什么奇妙方法?说来却又平常:

他每逢星期六的日子,心定搭那下午四点多钟的火车,由北京到天津走一趟,而且还不惜小费,总买的头等车票。因为在京城里够得上做阔人的人,天津租界上一定都有洋楼公

馆。一星期内在北京办了六天公事,在这些惯于享福的阔人看来,实是为国勤劳,疲乏得不堪了。好容易遇着星期日是放假的日子,可以休息一天,便都不约而同在星期六搭下午那班火车,全凑合到天津去。表面上就是回天津公馆料理私事,其实却把工夫全用在嫖赌玩耍上……济川利用这个机会,每次都在这头等车里盘桓。见着头等客厅散座上的阔人随从及仆役之类,不揣冒昧,径自上前去送名片,问姓名,拉交情;并常常向饭厅里叫些茶点,买些纸烟,殷勤款待,托他们带领到阔人包房中去觐见。见面之后,他本来为人机警,善于言词;又预先探听各阔人的性情怎样,癖好如何,分别出种种言语去迎合。

当时从北京到天津火车要三个小时,对阔人说来,像贡济川这样一个清客作为消遣品,也觉得很对胃口。阔人下车时若问你到天津何事,他说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办。如果阔人邀他,那就一起到我公馆里去玩玩,他就做了“跟屁虫”,如果没有人邀他,他就到小旅馆过夜,周一早晨再跟阔人们同车回京。他见机行事,不时与阔人来往,就眼看他一帆风顺,官运亨通。由司法部的小差使而到财政部,由主事而秘书,由秘书而新议员,又由新议员回到财政部任顾问,还兼任了些银行董事之类的阔差使。后来有人知道了他往来京津之间的秘密,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礼拜六”。

天津与北京毗邻,一方是洋场,一地是官场,但各有专长与优势,各有各的用处。贡济川吃透了它们的特性和地缘之便而利用之,果然取得了大效果。在作品中能出现这样的情节,真可谓说尽了清末民初时期,这两大城市乃是畸形双胞胎。

仅就上面的若干实例,我们就能感知通俗小说是一座映像国情、官风、民俗的富矿。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四大城市,有它们各自的历史沿革、地缘优劣,在近现代转型期中,它们的官场、商场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变异形态,而清末民初官商们的炫耀式消费却又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一幅都市畸形风尚的长卷,足供我们对这些丑陋的历史图景,作一番形象化的观览,让清末与北洋军阀时期的社会显形。

〔责任编辑:平 啸〕

A Morbid Urban Trend Spurred by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Fan Boqun

Abstract: In terms of such four cities as Shanghai, Beijing, Guangzhou and Tianjin in transition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ir official circles and business worlds have distinctiv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social variations, but officials and business people shared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namely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shaping a morbid urban trend which was a social phenomenon and a cultural heritage. Its changes and features are revealed vividly in popular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urban trend; five treaty ports